

# 鸚鵡杯及其他

謝明良



鸚鵡杯是中國中古時期以來文獻所屢見不鮮的飲酒器具。關於其研究，已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孫棣的考證。孫文言簡意賅，頗得要領，個人讀後獲益良多。不過，鑑於新出考古資料以及運用電腦鍵入關鍵詞彙所能獲得的大量訊息，本文擬再次針對所謂鸚鵡杯作一省思，進而談談古陶瓷所見鸚鵡器式和圖像。

## 中國文獻所見鸚鵡杯及考古出土例

有關鸚鵡杯的記事，無疑要以唐代大詩人李白（七〇一～七六二）的〈襄陽歌〉最為著名，其影響也最深遠，是後世文人行文賦詩時經常援引譬喻的千古名作。詩云：

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  
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公醉似泥。  
鸚鵡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  
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  
恰似葡萄初釀醅。此江若變作春酒，  
壘曲便築糟丘台。（下略）

薛道衡詩「同傾鸚鵡杯」，唐人駱賓王賦「鸚鵡杯中休勸酒」等所詠均指同類器物，另參酌東晉初陶侃曾「上成帝螺杯一枝」（《藝文類聚》卷七三引《陶侃故事》）以及《宋書·張暢傳》載劉宋「孝武又致螺杯雜物，南土所珍」等記事，得出結論認為所謂鸚鵡杯，指的是南海鸚鵡螺所製的杯，而

此類鸚鵡螺杯之早期考古實例可見於一九六〇年代發掘南京人臺山東晉咸康六年（三四〇）王興之墓出土的裝鑲有銅釦和銅雙耳的螺殼。（圖一）換言之，孫氏認為李白〈襄陽歌〉的鸚鵡杯即鸚鵡螺杯。

為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信曰：『庶子好為術數』，遂命更滿酌」。（前集卷十二〈語資〉）由於海螺殼尾旋尖處作數層，僅一穴相通，螺腔造型詰曲，飲酒時不易一飲而盡，所以最適合作酒。唐代螺杯實物見於河南省偃師杏園村唐大中元年（八四七）穆棕墓（一〇二五號墓），係將螺殼橫剖，出土時內置五顆石骰子（圖二），揚之水認為此應與宴飲時行骰盤令有關，如元稹《何滿子歌·張湖南座為唐有熊作》：「如何有熊一曲

終，牙籌記令紅螺盞」即是。（揚之水，二〇一一）本文基本同意螺杯骰子應和行酒令有關的看法，與此同時想另提示的是，元稹詩中的「紅螺盞」可能和《西陽雜俎》的「鸚鵡杯」有別，至少在宋人周去非眼中，「有剖半螺，色紅潤者曰紅螺盃，有形似鸚鵡之睡未喙綠首者，曰鸚鵡盃」（《嶺外代答》卷六「螺盃」），兩者造型顯然並不相同。相對年代在七至八世紀初的唐三彩可見剖半螺且做出注流的螺杯（圖三），但《西陽雜



圖一 鸚鵡螺杯 中國南京東晉咸康六年（340）王興之墓出土



圖二 螺杯和骰子 中國河南省偃師唐大中元年（847）穆棕墓出土



圖三 唐三彩螺杯 日本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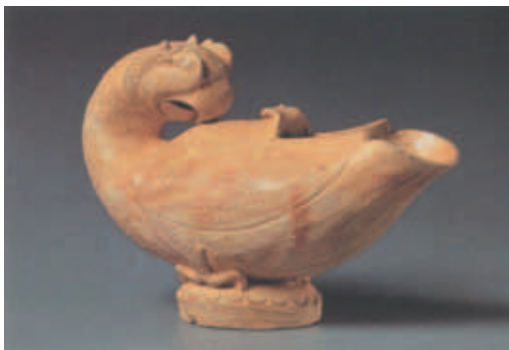
圖五 白瓷鸚鵡杯 中國河北省內丘邢窯窯址出土



圖六 白瓷鸚鵡杯 日本私人藏



圖七 越南白瓷鸚鵡杯 比利時布魯塞爾王立美術歷史博物館藏



圖八 越南白瓷鸚鵡杯 東南亞古陶瓷學會藏

### 越南陶瓷所見鸚鵡形器

文獻記載今越南中南部地區的古國占城 (Campadesa, 中國典籍稱

構思。就此而言，河北省內丘邢窯窯址出土 (圖五)，或日本私人藏的隋至初唐白瓷鸚鵡形杯 (圖六)，均是以腹為杯，頭向其腹，頭部寫實，整體造型構思和前引偃師唐墓出土的鸚鵡杓有異曲同工之趣。所以，我認為〈襄陽歌〉中的鸚鵡杯極有可能正是指這類雕琢形塑成鸚鵡狀的酒杯，其質材可以是螺殼，但也可以是金銀、玻璃等，當然也包括陶瓷。

「林邑」，曾在唐代太宗時進獻白色或五色鸚鵡。(《舊唐書·林邑國傳》) 另一方面，越南古陶瓷當中亦見以鸚鵡為飾或鸚鵡象生形器，如比利時布魯塞爾王立美術歷史博物館 (Musées Royaux de Cinquantenaire, 以下簡稱MRC) 的一件收藏單位將之視為香爐，森本朝子懷疑其或屬燈器的鸚鵡形器即為著名的實例。(圖七) (森本朝子，一九七九~一九八三) 該鸚鵡形器整體施罩黃白色釉，鸚鵡眼、喙和台座施褐彩，類似標本見於越南北部河內 Vinh Phuc 一處推測屬窯址遺留採集品

(長谷部樂爾，一九九〇)，結合作品的胎釉等特徵可以確認其應係越南北部所生產，推測年代約於十一世紀初期。(森本朝子，一九七九~一九八三) 我未能親眼目驗MRC藏的這件被稱為鸚鵡香爐或燈器者，但若比較收錄在一九九〇年代 John Stevenson 等編的越南陶瓷圖籍之東南亞古陶瓷學會藏同式作品的清晰彩圖 (圖八)，似可推測MRC藏品鸚鵡尾部修繕部位之修補復原方案並不正確，其尾部原本造型極可能亦如東南亞古陶瓷學會藏品般呈透天的卷口。另外，依據圖版說明，則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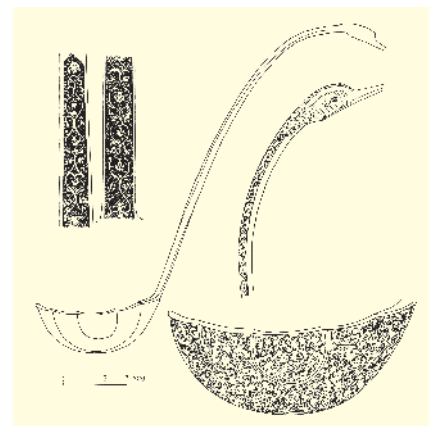
組》所載用以罰酒的鸚鵡杯，從字句推敲其狀應非剖半的螺，而是形似鸚鵡的鸚鵡螺杯。如果借用三國吳人萬震著《南海異物志》的描述，則鸚鵡螺之造型是「狀如覆杯，形如鳥，頭向其腹，視之似鸚鵡，故以為名」，其造型近於前揭東晉王興之墓的鸚鵡螺杯。

問題是，李白〈襄陽歌〉的鸚鵡杯果真屬形似鸚鵡的鸚鵡螺杯嗎？此一看法雖不無可能，但未必確實無誤。由於〈襄陽歌〉膾炙人口，所以很早就出現有關鸚鵡杯實體的狐疑。如元人伊士珍《瑯嬛記》提到金母召群仙宴於赤水，坐有玉鸚鵡杯、玉鸚鵡杓，進而據此認為鸚鵡杯恐非南海海螺，意即應係玉杯。清人王琦於《李太白集注》中曾對此予以駁斥，認為：「說頗新僻，然他書未有言及者，恐是因太白詩語而偽造此事亦未可知也」。(卷七) 姑且不論孰是孰非，在此應予留意的是，與李白同時代的杜甫 (七一二~七七〇) 詩亦曾涉及鸚鵡杯，其詩曰：「雕琢形儀似隴禽，綠楊影裏可分斟」。隴州土貢鸚

鵡頗具盛名，故鸚鵡往往又被稱作隴禽或隴客，所以「雕琢形儀似隴禽」也可單純直接地理解為雕刻成鸚鵡形，亦即呈現鸚鵡造型的酒杯；參酌北宋胡宿《文恭集》題為「鸚鵡杯」的詩云：「介族生螭蚌，杯形肖隴禽，曾經良匠手；見愛主人心」，可以得到一個初步印象，即唐宋時期所謂鸚鵡杯當中，還存在一類曾經工匠雕琢加工者，此包括於螺殼上進行加工 (如《文恭集》)，但也不排除有其他質材的可能性。時代相對較晚，宋人周密《武林舊事》已經提到宣和年間有由外國進口硬度極高可以磨金的「翡翠鸚鵡杯」。(卷七)

其實，我們應該留意〈襄陽歌〉中與鸚鵡杯相提並論的是鸚鵡杓，後者是用來挹酒的道具，如北宋黃庭堅詩云：「鸚鵡杓，鸚鵡杯，一杯一杯復一杯」(《山谷集·外集》卷五)；南宋汪元量《湖山類稿》亦云：「我有鸚鵡杯，君有鸚鵡杓，一杯復一杯，酒盡還沽共君酌」，是成組合用的酒具。鸚鵡又稱水老鴨、魚鷹、鷓，嗜食魚類，長頸，很早就被利用來

捕魚。河南省偃師杏園唐開元二十六年 (七三八) 李景由墓 (二六〇三號墓) 曾出土此類銀鑲金鸚鵡杓，勺柄扁方修長，彎柄末端呈鳥頭狀，器表以魚子紋為地，鑿刻寶相花及雀鳥。(圖四) 如果本文的上述比附無誤，則該鸚鵡杓是抽象地表現出鸚鵡的長頸，並於柄端飾近於寫實的頭部。這樣一來，經常與鸚鵡杓配對使用的鸚鵡杯就有可能亦具類似的造型或裝飾



圖四a 銀鑲金鸚鵡杓線繪圖



圖四 銀鑲金鸚鵡杓 中國河南省偃師唐開元二十六年 (738) 李景由墓出土



圖十一 越南青花鸚鵡形盃 Hoi An Shipwreck打撈品



圖十二 越南青花五彩鸚鵡形盃 Hoi An Shipwreck打撈品



圖十三 白瓷印花盤 韓國新安沉船打撈品

來通式角杯和中國本土兗甃習合的結果（揚之水，二〇一一），從其徵引的多幀圖像資料看來，我也傾向同意其為酒杯的看法。由於前引越南白瓷鸚鵡形器與中國白瓷摩羯形器的風格相近，而越南北部河內 Vinh Phuoc 所採集白釉鸚鵡形飾標本作風也顯示其和中國廣東省白瓷之間可能的連繫（長谷部樂爾，一九九〇），因此，如果說中國製白瓷或青瓷摩羯形器屬酒杯，則構造

與之相近且同為仿生器式的所謂越南白釉鸚鵡燈具，就有可能並非燈器，而是飲酒的道具。換言之，此即越南李朝（一〇〇九～一二二五）前期所燒造的飲酒用鸚鵡杯。考慮到宋人文集不乏鸚鵡杯的記述，不難想見宋代應亦曾生產鸚鵡杯，可惜目前並無實物傳世。就此而言，從越南李朝白釉鸚鵡杯或可遙想宋代鸚鵡杯的可能造型特徵。

然而，相對年代約在十一世紀的越南白瓷鸚鵡形器果真是燈器或香爐嗎？回顧以往有關該類器式的用途推測，主張香爐說者因為並未列舉支持其說法的任何依據，在此可略而不談，至於所謂燈器說則是參考了佐藤雅彥推測應屬燈具的十一世紀中國製白瓷。（圖九）後者造型呈摩羯魚形，下頰突出，佐藤氏主要即是基

於此一造型特徵而認為其或係受到伊蘭地區燈器的影響而出現的。孫機亦持類似看法，並且進一步推測此類摩羯燈乃是採用「蓋唇搭柱式」的點燈法，其淵源可追溯至西亞和地中海區域。（孫機，一九八六）就已公布的這類具有摩羯魚外觀特徵之中國窯製品的造型構造看來，絕大多數製品器內相通無屏障；個別器內疑設牆但尚待證實的例子見於孫機所引中國遼寧省北票水泉一號遼墓所出報告書



圖九 白瓷摩羯魚形杯 日本私人藏



圖十 越窯青瓷摩羯魚形杯 瑞士梅因堂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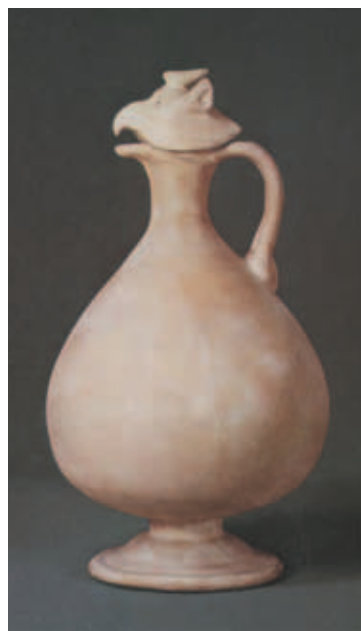
南亞古陶瓷學會的該鸚鵡形器乃是燃油燈具。

所稱的「龍魚形青瓷水盂」。（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許玉林〕，一九七七；莫家良，一九九四）不過，相對於發掘報告書並未涉及該「水盂」的構造特徵，孫機則因觀察到該器腹內中間另設遮屏，將器分隔成前後兩個部分，頗不利傾注液體，因而主張其為燈器，亦即將冷水注入器後部，並在前部盛油置炷，瓷蓋因被冷水降溫而達到省油目的之所謂省油燈。（孫機，一九八六）

我未能親眼目驗北票遼墓出土耀州窯青瓷摩羯形器之腹內是否確實設置屏障，在此沒有資格評述其是否確為省油燈具，但若就流傳於世為數不少的白瓷或越窯青瓷而言（圖十），其器內均無屏障，故不僅可順利傾注內盛的液體，同時不易搭置油炷。因此就作品的造型機能而言，以水盂說法較近合理。雖然，也有人將此式器內無屏障的越窯青瓷摩羯形器視為燈具。（Au Rikh, 1982）

應予一提的是，經由近年揚之水針對古文獻和圖像資料的排比，認為這類摩羯形器其實是象生的船形酒杯，故可稱之為摩羯式酒杯，是西方

越南黎朝（一二二八～一五二七）亦見不少以鸚鵡為主要裝飾的陶瓷，如船載大量十五世紀後期至十六世紀前期越南陶瓷卻失事於會安（Hoi An）、占婆（Lu Lao Cham）島域的著名會安沉船（Hoi An Shipwreck）即見青花五彩鸚鵡形杯盃，造型呈鸚鵡啣桃狀。（圖十一、十二）會安沉船此式鸚鵡飾杯盃的原型極可能也是來自中國，比如說韓國木浦打撈上岸伴出至治三年（一三三三）紀年木簽之新安沉船出土的白瓷四花口折沿盤，盤面壓印陽紋折枝桃，桃上立一鸚鵡做啄食狀，並有榜題：「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圖十三）據此可知，越南黎朝的鸚鵡啣桃式杯盃



圖十八 唐代白瓷注壺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十七 白瓷鸚鵡形注壺  
香港私人藏



圖十六 綠釉鸚鵡形注壺 加拿大艾大略博物館藏



圖十四a 足底  
「鸚鵡」墨書



圖十四 褐釉鸚鵡形注壺 中國河北省定縣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 靜志寺塔基出土



圖十五 褐釉鸚鵡形注壺  
中國河南省鄭州市東西大街出土

所呈現的母題乃是來自鸚鵡啄金桃的典故，由於桃形盃內可容物或裝盛液體，所以亦可將之納入中國製作鸚鵡杯的傳統脈絡來予以掌握。事實上，陳貞慧（一六〇四—一六五六）《秋園雜佩》載：「余友問卿家藏鸚鵡啄金盃，高足磬口，一名四妃十六子，又名太平雙喜。……每過雲起樓，促膝飛觥，出成盃勸酒」。問卿即吳問卿，是擁有富春卷及時大彬做供春壺式的著名藏家，其所珍藏鸚鵡啄金盃帶高足造型。

### 唐宋時期的鸚鵡形注壺和其他

經報導的中國出土鸚鵡形注壺計三例，分別是：內蒙古和林格爾三

號遼墓綠褐釉製品（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李逸友〕，一九六一）、河北省定縣靜志寺塔基褐釉製品（圖十四），以及河南省鄭州市東西大街出土的褐釉殘器。（圖十五）其次，印尼爪哇島井里汶（Cirebon）港北邊發現的所謂Cirebon Cargo也打撈出同式褐釉鸚鵡形注壺。由於Cirebon Cargo發現的遺物當中包括一件底刻「戊辰徐記燒」的越窯青瓷蓮瓣紋鉢，打撈公司進而參酌沉船伴出其他文物，認為該船的絕對年代應在「戊辰年」，亦即西元九六八年。由於沉船伴出的越窯青瓷龍紋盤酷似北宋咸平三年（一〇〇〇）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的同

類製品，我保守估計Cirebon Cargo及其所舶載的鸚鵡形注壺的相對年代有可能在十世紀後期至十一世紀初期之間。（謝明良，二〇〇八）將此一相對年代結合出土褐釉鸚鵡形注壺的靜志寺舍利塔因係北宋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昭果大師所建，又可認為這類施單鉛釉的鸚鵡形注壺似乎較流行於十世紀後期。

相對於以往部分學者基於內蒙古遼墓出土例而將包括靜志寺塔基在內的鉛釉鸚鵡形注壺全部視為遼窯製品，早在一九七〇年代矢部良明就已指出其可能屬定窯所燒製（座右寶刊行會，一九七〇），迄一九九〇年代宿白等也持類似看法。（宿白，一九九七）從胎釉和刻劃花作風結合前數年公布的河南省鄭州出土例以及Cirebon Cargo的類似作品，可以初步判定上引幾件鉛釉鸚鵡形注壺應非遼窯製品。但其是否確實來自定窯？還有待證實。另外，加拿大多倫多市Royal Ontario Museum收藏的一件蓑豐認為是九世紀後期至十世紀前期的綠釉鸚鵡「酒器」，鸚鵡背設六花口，頸胸部位置花蕾形注

流（圖十六），造型奇特。考慮到其尺寸不及十公分，造型偏小，我未見實物，但若非贗品則有可能是前所未見的鸚鵡注壺、注盃或竟是鸚鵡杯。

鉛釉鸚鵡形注壺之外，亦見高溫

白瓷製品，呈鸚鵡立於奇石造型，頸部飾環帶，環帶至鳥背設把手，鸚鵡喙和雙眼施褐彩。（圖十七）收入圖錄雖將之定為遼代製品，但從胎釉以及岩石上方的陽紋花卉裝飾近於瑞典Carl Kempe舊藏唐代邢窯白瓷三足爐爐身陰刻圖紋（Gustaf Lindberg, Hsing-Yao and Ting-Yao, 1953），我推測該注壺

有可能是唐代定窯或邢窯系製品，其和前述唐代白瓷鸚鵡杯相得益彰，很是匹配。如前所述，林邑國曾貢獻太宗白鸚鵡，王維也曾做《白鸚鵡賦》，《明皇雜錄》所載開元中由嶺南進獻的聰慧洞曉言詞且能朗誦詞臣詩篇，被玄宗和楊貴妃暱稱作「雪衣娘」的白鸚鵡更是家喻戶曉的傳奇寵物。看來，唐代的白瓷鸚鵡杯和白瓷鸚鵡形注壺應該就是對當時外國進獻白鸚鵡的真實寫照。只是陶瓷製品所見鸚鵡，往往與鳳鳥不易明顯辨識，例如



圖十九 鳥譜圖冊 葵黃頂花小白鸚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一般所謂白瓷鳳首注壺（圖十八），壺蓋鳥首也有幾分形似鸚鵡，頭頂翼狀冠毛亦近於鸚鵡頭上的所謂「芙蓉冠」（圖十九），故其鳥屬之別委實令人困惑。

鸚鵡象生器物之外，唐宋時期金銀器、銅器或陶瓷等質材的器皿亦見不少鸚鵡裝飾母題。不僅如此，另可見到手佇立鸚鵡的陶人俑，如上海博物館藏盛唐三彩俑即為一例（圖二十）；遼寧省朝陽市黃河路唐墓出土的石男俑右臂曲肘，手上立鳥亦形似鸚鵡。（圖二一）雖則也有認為該辮髮石俑族屬粟末靺鞨，手佇立的鳥禽可



圖二四 南非好望角荷蘭東印度公司Oosterland沉船（1697）遺物所見鸚鵡盃盃像  
引自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57 (1992-1993)



圖二三 歐洲水手圖 版畫 約1700年

到薩珊系王冠影響的雙翼鳳鳥（田邊勝美，一九九二），不過，設若玄奘的記錄無誤，則當時應該存在戴鸚鵡冠的天王造像。唐代文獻有不少鸚鵡與佛教的因緣記事，除了前述受到玄宗和楊貴妃寵愛可頌讀《心經》的白鸚鵡「雪衣娘」之外，元代念常（一二八二～一三四一）撰《佛祖歷代通載》亦載章阜好釋氏法，嘗訓鸚鵡念佛。內蒙古寶山二號遼墓北壁壁畫女子展卷且有鸚鵡相伴，結合壁上題詩：「雪衣丹背隴山禽，每受宮闈指教深，不向人前出凡語，聲聲皆是念經音」，無疑是表現鸚鵡頌經的場景，也因此被命名為《頌經圖》。（圖二二）與此相關的是，相對於吳玉貴認為畫面的女子是楊貴妃（吳玉貴，一九九九），漆紅則從女子體態及墓壁題詩內涵乃是表明女子「賢明」和「貞順」，主張《頌經圖》上的展卷女子應是前秦閨中楷模蘇若蘭（漆紅，二〇〇一），我同意這個看法。

基於鸚鵡頌讀佛經以及護衛伽藍寺院的文獻記事，令人暮然醒悟前述北宋靜志寺舍利塔基為何會出土鸚鵡形注壺。（圖十四）該注壺底部露胎處帶「鸚鵡」墨書（圖十四a），此似乎透露出瘞埋贊助者試圖在鸚鵡象生造型之外，再次以墨書的方式來強調鸚鵡存在的事實。對於北宋的佛教徒而言，玄奘《大唐西域記》所載鸚鵡護衛佛院的靈異，一定是他們熟悉且津津樂道的話題，也因此才會將可能做為酒器的鸚鵡形注壺刻意地加上「鸚鵡」銘記而後瘞埋於舍利塔塔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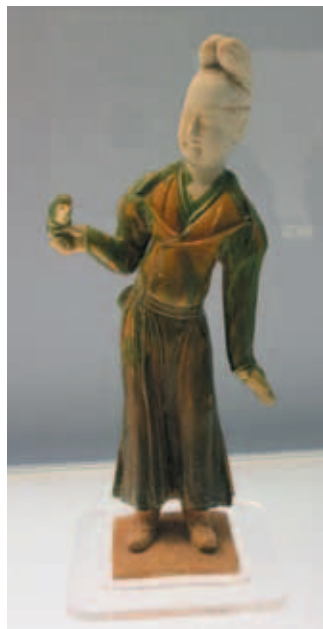
### 景德鎮輸往歐洲的鸚鵡象生器和歐洲的螺杯趣味

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臨，歐洲和遠東的相遇愈形頻仍。航海來亞洲的歐洲水手經常將鸚鵡攜回歐洲待價而沽（圖二三），而鸚鵡也做為具有異國趣味的珍禽頻繁地出現在歐洲的繪畫或掛毯等手工藝製品。成立於十七世紀初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不止一次地向景德鎮下注訂單要求燒造鸚鵡器飾，南非好望角打撈一六九七年沉沒的荷蘭東印度公司Oosterland沉船發現的中國盜鸚鵡像即是其例（圖二四）；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也收藏有由

能是產於鞞鞞之東，遼宋之後稱為海東青的名貴鷹鶴。（姜念思，二〇〇五）另外，大英博物館藏唐代女俑冠髻亦具鸚鵡造型特徵。（William Watson, 1984）值得留意的是，玄奘（六〇〇～六六四）著《大唐西域記》《迦畢試國》條（梵文Kapishya，在今阿富汗境內



圖二一 石俑 線繪圖 中國遼寧省朝陽市唐墓出土



圖二十 唐三彩俑 中國上海博物館藏

Begam) 所載的一則鸚鵡靈異，即：

伽藍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坎地藏寶，質子之所藏也。故其銘曰：「伽藍朽壞，取以修治。」近有邊王貪婪凶暴，聞此伽藍多藏珍寶，驅逐僧徒，方事發掘。神王冠中鸚鵡鳥像，乃奮羽驚鳴，地為震

動。王及軍人，俯身僂仆，久而得起，謝咎以歸。

以上說的是，神王冠中的鸚鵡顯靈，振羽驚鳴，威懾驅逐了覬覦埋藏於寺院地下寶藏的貪婪盜匪。此處神王指的應是兜跋毘沙門天。儘管做為毘沙門天像容之一的華麗頭冠，大多飾受



圖二二 內蒙古寶山二號遼墓《頌經圖》壁畫 引自《文物》



圖二八 裝飾金銀飾的鸚鵡螺杯 德國柏林克普尼克宮手工藝博物館藏



圖二九 歐洲好奇箱所見鸚鵡螺 引自《航路アジアへ！》



圖三十 荷蘭靜物畫家Willem Kalf (1622-1693) 畫作中的中國瓷器和鸚鵡螺杯 引自<http://www.wga.hu/frames-e.html?html/k/kalf/index.html>

時又是馬族的護衛者，出行時騎乘馬車，並有海龍形怪物雀躍舞蹈致敬。(Thomas Bulfinch, 1978; H. A. Kuhn, 2002) 德國國立德勒斯登博物館 (Dresden National Museum) 或柏林克普尼克宮手工藝博物館 (Kunstgewerbemuseum Schloss Köpenick) 等歐洲許多公私收藏也見類似的十七世紀鸚鵡螺杯，後者藏品下方台座另飾海神之子呈人魚造型的Triton。(圖二八) 於鸚鵡螺上進行金屬裝鑲早見於前引南京東晉王興之墓(三四〇)(圖一)；明天順三

年(一四五九)王佐增補明初曹昭著《格古要論》也談及經人工琢磨過後的鸚鵡螺「用銀或金廂足作酒盃」。(卷六〈珍寶論〉)明人顧珩《海槎餘錄》甚至記載好事者將鸚鵡螺「用金鑲飾，凡頭頸足翅俱備，置之几案，亦異常耳」將其作為獵奇的觀賞品，此一賞鑑趣味不由得會讓人聯想到十七世紀歐洲富裕人家所設置好奇箱(Cabinet of Curiosity)中的鸚鵡螺。(圖二九)

荷蘭十七世紀靜物畫家威廉·



圖二六 歐洲錯視畫所見鸚鵡 (1719) 荷蘭阿姆斯特丹歷史博物館藏

中國進口的康熙年間景德鎮彩繪鸚鵡像。(圖二五)這類鸚鵡塑像既被置於居宅壁爐上方或置放於開放式木質櫥櫃以為觀賞之用，其也是豪門貴族自宅所設「中國室」或「瓷器室」收貯的對象。從完成於一七一九年的一幅流行於荷蘭之具有立體寫實效果名為〈中國瓷器與南國鳥禽〉的所謂錯視畫 (beïtgerie) (圖二六)，可以想見鸚鵡等禽鳥是和亞洲陶瓷同被視為來自遙遠東方的珍奇而受到注目。生涯以悲劇收場的著名法國王妃Marie-

Antoinets (一七七五~一七九三) 在凡爾賽宮的居室也收藏有鑲嵌寶石的鸚鵡像。(Beurceley & Rindre, 1986) 事實上，凡爾賽宮傳世的十八世紀前期由Gobelins (哥布林) 製造廠La Croix作坊生產的以十七世紀畫作為底本的〈王的歷史· Fuentes伯爵謁見圖〉不織布掛毯，正上方帶框狩獵圖之下亦見鑲裝有持三叉戟的人物和騎馬力士的鸚鵡螺杯。(圖二七) 從三叉戟持物可知其表現的正是可呼風喚雨的海神Poseidon (Neptune) · Poseidon同



圖二五 彩繪瓷鸚鵡像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藏



圖二七 法國不織布掛毯所見鸚鵡螺杯圖飾 凡爾賽宮藏

圖版出處

- 圖1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人台山東齊興之夫婦墓發掘報告〉，《文物》1965年第6期，圖版壹之7。清晰彩圖見：南京市博物館，《六朝風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97，圖67。
- 圖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優待西園村唐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圖版42之5。
- 圖3 石川縣立美術館，《中國陶磁名品展—イセコレクションの至寶—》，石川縣：石川縣立美術館，2012，頁26，圖17。
- 圖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前引《優待西園村唐墓》，頁132圖121之1；及彩版5之1、2。
- 圖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王會民等），〈邢窯遺址調查、試掘報告〉，《考古學集刊》2004年第14期，圖版22之5。
- 圖6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神品とよげれたやきもの・宋磁特展圖録》，朝日新聞社，1999，頁89，圖52。
- 圖7-8 John Stevenson and John Guy, in *Vietnamese Ceramics: A Separate Tradition* (Chicago: Avery Press, 1997), p. 186.
- 圖9 座右寶刊行會編，《世界陶磁全集·宋》，東京：小學館，1977，頁316，圖148，佐藤雅彥解說。
- 圖10 筆者攝影。
- 圖11-12 Butterfields, *Treasures From The Hoi An Hoard Important Vietnamese Ceramics From a Late 15th/ Early 16th Century Cargo*, vol. 2 (San Francisco and Los Angeles, October 11-13, 2000), p. 206, No. 1703, p. 216, No. 1727.
- 圖13 The Shinan Wreck (新安船)，木浦：文化財廳及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2006，頁104-105，圖94。
- 圖14 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圖版1右圖。
- 圖15 劉濤，《宋遼金紀年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6，圖1之30。
- 圖16 Mino Yutaka, *Ceramics in the Liao Dynasty* (New York: Institute in America, 1973), p. 80, pl. 54.
- 圖17 蘇芳淑編，《松漢英華·契丹藝術與文化》，香港：香港大學文物館，2004，頁326-327，圖VII之12。
- 圖18 座右寶刊行會編，《世界陶磁全集·隋唐》，東京：小學館，1976，頁31，圖18。
- 圖1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鳥譜》，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頁36。
- 圖20 筆者攝影。
- 圖21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李新全等），〈遼寧朝陽市黃河路唐墓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8期，頁69，圖12之2。
- 圖22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齊曉光等），〈內蒙古赤峰寶山遼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1期，彩色插頁6。
- 圖23 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航路アジアへ！ 鎮國前夜の東西交流》，東京：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1998，頁202，圖250。
- 圖24 Jane Klose, "Excavated Oriental Ceramics from the Cape of Good Hope: 1630-1680,"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57 (1992-1993), p. 76, fig. 8.
- 圖25 Jörg & van Campen,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 (Amsterdam: Philip Wilson, 1997), p. 193, pl. 218.
- 圖26 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前引《航路アジアへ！》，頁162參考圖。
- 圖27 Fastes de Versailles (《華麗なる宮廷—ヴェルサイユ展》)，神戸：神戸市立博物館，2002，頁102-103，圖38。
- 圖28 筆者攝影。
- 圖29 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前引《航路アジアへ！》，頁160圖140。
- 圖30 <http://www.wga.hu/frames-e.html?html/k/kalf/index.html>，檢索日期：2012/11/06。
- 圖31 神戸市立博物館，《日蘭交流のかけ橋》，神戸：神戸市立博物館，1998，頁54，圖71。

引用文獻出處

1.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李逸友），〈和林格爾縣土城子古墓發掘簡介〉，《文物》1961年第9期。
2. 田邊勝美，〈兜跋毘沙門天像の起源〉，《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紀要》vol. XIII, 1992。
3. 吳玉貴，〈內蒙古赤峰寶山遼壁畫墓「須經圖」略考〉，《文物》1999年第2期。
4. 長谷部樂爾，《インドシナ半島の陶磁》，東京：瑠璃書房，1990。
5. 皆川雅樹，〈鸚鵡の贈答—日本古代對外關係史研究の一節〉，收入矢野建一等編，《長安都市文化と朝鮮、日本》，東京：汲古書院，2007。
6. 姜念忠，〈遼寧朝陽市黃河路唐墓出土鞞石俑考〉，《考古》2005年第10期。
7. 座右寶刊行會編，《世界陶磁全集·隋唐》，東京：小學館，1976。
8. 殷光明，〈西北科學考察團發掘敦煌羅宗岳畫像磚墓述論〉，收入樊錦詩等編，《敦煌文獻、考古、藝術綜合研究—紀念向達先生誕辰110周年國際學術研究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
9. 莫家良，〈遼代青瓷龍魚形水盂〉，收入遼寧省博物館藏寶錄編輯委員會編，《遼寧省博物館藏寶錄》，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
10. 孫機，〈摩揭燈—兼談其相關問題〉，《文物》1986年第12期。
11. 孫機，〈鸚鵡杯與力士鐘〉，收入孫機等，《文物叢談》，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12. 宿白，〈定州工藝與靜志、靜衆兩塔地宮文物〉，收入出光美術館編，《地下宮殿の遺寶：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東京：出光美術館，1997。
13. 揚之水，〈蜀賦與動盪〉，收入《奢華之色—宋元明金銀器研究》卷3，北京：中華書局，2011。
14. 森本朝子，〈北部ヴェトナム出土の所謂宋代陶磁について—ブリュッセル王立美術博物館蔵のユエ・コレクションをめぐって〉，《東洋陶磁》9，1979-1983。
15. 漆紅，〈「織錦回文圖」—寶山二號遼墓壁畫の畫題、その繪畫史的意義について〉，《美術史論叢》17，2001。
16.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許玉林），〈遼寧北票水泉一號遼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第12期。
17. 謝明良，〈關於所謂印坦沉船〉，收入《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社，2008。
18. Beurdeley & Raindre, *La Porcelain des Qing "Famille verte et 'Famille Rose', 1644-1912"*, Fribourg, 1986，轉引自Jörg & van Campen, op. cit.
19. Norman Bryson (丁寧譯)，《注視被忽視的事物—靜物畫四論》，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00。
20. Thomas Bulfinch (野上彌生子譯)，《ギリシア・ローマ神話》，東京：岩波書店，1978。
21. H. A. Kuhn (秋楓等譯)，《古希臘的傳說和神話》，北京：三聯書店，2002。
22. Gustaf Lindberg, Hsing-Yao and Ting-Yao,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25 (1953).
23. Krzysztof Pomian (吉田城等譯)，《コレクション—趣味と好奇心の歴史人類學》，東京：平凡社，1992。
24. Abu Ridho, *Museum Pusat, Jakarta, Oriental Ceramics*, vol. 3 (Tokyo,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Ltd., 1982).
25. William Watson, *Tang and Liao Ceramics* (New York: Rizzoli, 1984).

卡爾夫 (Willem Kalf, 1622-1693) 的畫作〈有金屬製品的靜物〉或〈有船殼杯的靜物〉亦見裝鑲金屬飾的鸚鵡螺杯 (圖三十)，後者螺杯前方另置貼塑浮雕人物的中國明代晚期青花蓋罐，螺杯上方裝鑲海神 Nepunt 立於海龍頭頂。Norman Bryson 在論靜物畫時有一段關於卡爾夫畫作桌上的物品的有趣評述。即：桌上的物件其實更像是從屬於珍寶室 (Wunderkammer) 的空間，收藏家的藏品本身來自一種新的空間，即經由貿易與殖民地、地理的發現、投資與資本等等，貝殼則別有情意地概括海上商人的財富。



圖三一 《唐蘭船持渡鳥獸圖》中的鸚鵡  
日本慶應義塾圖書館藏

(Norman Bryson, 2000) 經由以上幾件金屬裝鑲螺杯，可以附帶說明的是亞洲的鸚鵡螺和希臘神話海神的結合，似乎是十七世紀歐洲人眾所喜愛的母題，其甚至成了一種格套配置，想來是和海神 Poseidon/ Triton 用海螺吹出驚天動地音響可在海上興風作浪的傳說有關。到了十八世紀，貝殼更是做為博物館的一部分受到法國等地收藏家的青睞。(Krzysztof Pomian, 1992)

小結

中國文獻有許多鸚鵡的相關記事，特別是對鸚鵡能言的稟賦著墨最多。如《漢書》載西漢武帝元狩二年 (西元前一二二年) 有南越國獻「能言鳥」；清代《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鸚鵡部》亦有歷代鸚鵡記載集成。鸚鵡不但「能言」，甚至「善於應答」，唐玄宗致送新羅聖德王的一對白色鸚鵡更是能言善道，「或稱長安之樂，或傳聖主之恩」(《三國史記》卷八《新羅本紀》聖德王三十二年(七三三)十二月條)，為唐朝進行了一

次成功的外交；《日本書紀》也記載遣唐使歸國經過百濟攜回鸚鵡(齊明二年(六五六))，而宋朝人赴日本時夾帶鸚鵡進獻之舉也是時有所聞。(皆川雅樹，二〇〇七) 鸚鵡以其豔麗的羽色和能言的特質著實博得了東亞各國人民驚羨的目光。就中國區域而言，不僅留存大量有關鸚鵡史料，且不時可見以鸚鵡為母題的繪畫或手工藝品。後者早期出土例見於一九四〇年代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發掘敦煌古墓所出鸚鵡畫像磚，從伴出的陶罐鐘墓文可知該墓墓主為翟宗盈，墓相對年代約在晉至十六國之間。(殷光明，二〇一一)

唐代以迄清代的鸚鵡飾製品數量不少，其使用脈絡也不一而足，除了唐宋時期的鸚鵡杯或鸚鵡螺杯之外，輸往歐洲的景德鎮鸚鵡像生器則為另一有趣案例，其和日本江戶後期畫家繪作的包括鸚鵡在內船載入歐的所謂《唐蘭船持渡鳥獸圖》(圖三二)，以及歐洲錯視畫、好奇箱的鸚鵡圖像，同為歐亞異文化交流中的一節。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